



Margaret Thatcher

撒切尔夫人自传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英] 玛格丽特·撒切尔 著 李宏强 译

唐宁街岁月_下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国内首次推出未删节全译本 出版以来在国外畅销不衰的经典自传

政治上，假如你想要的是空谈，去找男人；假如你想有所作为，去找女人。

——玛格丽特·撒切尔

我没有注意到我是个女人，我只当自己是个首相。

——玛格丽特·撒切尔

自身勇气，那便是她最伟大的品格。

——艾雷·尼夫

这本书不仅在英国引起轰动，而且在大西洋彼岸以及很多国家都受到热烈欢迎。除了那些与政府有关的人士，关注国际事务的大众读者也会对它产生兴趣。

——《booklist》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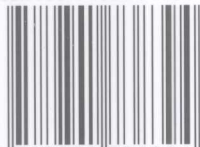
作者并没有试图对自己充满争议的政治生涯进行一种中庸、圆滑的解读，而是充满了“学院派”的行文风格，这使撒切尔夫人独特的个性魅力贯穿全书。即使是对撒切尔夫人最苛刻的批评者也将发现此书内容详瞻，富有启迪。

——《图书馆》杂志


Sinoread
创造优阅生活

建议陈列类别：人物传记

ISBN 978-7-80173-839-4



9 787801 738394 >

定价：69.00元（上下）

撒切尔夫人自传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唐宁街岁月。下

〔英〕玛格丽特·撒切尔 著 李宏强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宁街岁月(上下)/[英]玛格丽特·撒切尔著,李宏强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5

ISBN 978-7-80173-839-4

I. 唐… II. ①英…②李… III. 撒切尔, M. H. — 回忆录

IV. K 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6294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3754

唐宁街岁月

- 作 者 [英] 玛格丽特·撒切尔
译 者 李宏强
责任编辑 陈杰平 潘建农
策划编辑 李治威
美术编辑 姚 静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6开
50印张 853千字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839-4
定 价 69.00元(上下)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0995 传真:(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第16章 即将与之合作的人

第二个任期内的东西方关系，1983~1987年

重新评估苏联

进入1983年，苏联人肯定已经开始认识到，他们的操纵和恐吓的把戏很快就要被迫结束了。苏联为欧洲挖了一个“无核区”的陷阱，但欧洲各国政府现在已经不会掉进去了。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的准备工作又进了一步。3月份，里根总统宣布美国将发展战略防御计划。从技术和财政两方面来看，这一计划都将对苏联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接着，苏联在9月初击落了一架韩国的民航客机，致使机上269名乘客遇难。苏联政府竟然连道歉都没有，这不仅暴露出苏联政权的无情，还暴露出了它的无能。出于西方人的美好愿望，再加上苏联人的虚假宣传，一些人曾愚蠢地认为安德罗波夫先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思想开放、有教养的苏联领导人，认为他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现在，这种观点销声匿迹了。即使在自由的西方世界，苏联人也被描述为一个需要加以防备的病态国家，这恐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东西方关系陷入了新的寒冬，我们进入了一个危险的阶段，我和罗纳德·里根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的战略是在军事实力上能与之抗衡，在战场上能够打败他们。这种战略正在取得成功，我们必须继续推进这一战略。但是，我们在赢得冷战的同时，还必须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冷战本身从来就没有真正结束，至少从苏联方面来看是这样，只不过形式有所变化罢了。在朝鲜和越南，形势曾一度有所缓和，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直是两种体系之间相互对抗而产生的冲突。就此来看，那些共产主义理论家们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这两种相互对立的体制最终是互不相容的。由于双

方都拥有足以摧毁对方的核武器，所以我们必须做出必要的调整和妥协才能共存。我们西方国家现在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的制度和人民，多与生活在对方制度下的人民进行接触以保证我们获得持续的安全。无论是在冷战还是“热战”中，我们都需要了解敌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未来的某一天，你或许有机会把敌人变成朋友。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983年9月8日星期四，我在首相别墅召集苏联问题专家举行了一个研讨会。即使在我们自己这样开放民主的政府体系内，我们也难以获得外部的思想，这让我明白那些封闭的极权主义体系为什么会如此迟滞慵懒。从在野的时候起，我就习惯于举行范围广泛的研讨会，并总能从这些研讨会中得到启发和教育。但是从提交给我的与会者名单来看，我发现他们都是外交部的专家，而不是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这两者可不是一回事。于是，我在这份建议名单上做了这样的批注：

这不是我想要的方式。我不想把所有的初级大臣都召集来，也不是要把外交部里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叫来。外交部事先必须做好准备，但我还想要那些真正研究苏联问题的人——关于苏联问题的专家——以及拥有在苏联生活的经历的人。这个名单上有一半人还不如我知道得多。

事情又从头开始了。事实上，到研讨会重新开始的时候，我才感觉这次确实找对了人，而且他们还带来了一流的论文。这些论文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未来几年我们与苏联人以及他们的体系打交道时需要考虑的所有方面。我们讨论了苏联的经济、它的科技后劲及其可能的结果、宗教因素的影响、苏联的军事原则及国防开支，以及苏联从控制东欧国家中获得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低估了一个因素，那就是苏联的民族问题，而苏联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一问题才最终解体。对我来说，最有用的一篇论文可能是介绍和分析苏联的国家权力结构的文章。保守党在野时，我曾从罗伯特·康奎斯特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苏联的知识，现在这篇论文让我这方面的知识更加充实了。

当然，举办这次研讨会最终并不是出于学术目的，而是为了给我提供信息以帮助确定未来几个月乃至几年内对苏联以及东方集团的政策。但是，一直到

苏联解体的前夕，苏联问题专家们都一直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

下面我对这两种观点加以总结，但有可能过于简单化。一些人认为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体制上的差别并不是很大，这些人总体上是从政治分析和制度分析中得出了这一结论。这些人每晚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用自由民主的观点来对苏联进行分析。他们属于乐观派，就像在一条最长的隧道的末端寻找光线一样。他们相信在苏联的极权主义体制内的某个地方，理性和妥协会以某种方式突然出现。我记得罗伯特·康奎斯特曾经说过，体制分析的问题在于，如果你分析一匹马和一只老虎的构造，你会发现它们非常相似；但是，如果你用对待马的方法来对待老虎，那就会铸成大错。持另外一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历史学家，他们认为极权主义体制与自由民主体制存在着本质上而非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与这两种体制相关的方法途径也是如此。这些分析家认为，极权主义体制和自由民主体制下产生的政治领袖也是不同的，而某个个人几乎不具备改变这种体制的能力。

我自己的观点与第二种更加接近，但也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差别。我一向认为只要我们不抛弃我们的优势，西方的体制就会最终取得胜利，因为它是以唯一的，几乎是无限制的个人创造力和活力为基础。苏联的体制虽然压制了人的个性，但它从来也都没有完全得逞，像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布科夫斯基、瑞辛丝卡雅^[1]这样数以千计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被当局禁止出境的人的存在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一事实还意味着，有时从这一体制中获得权力的某个人也能够对这一体制发起挑战。我认识到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明显非常有限，但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与在其他方面和我观点一致的人还有所不同。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正在兴起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中找到最符合这些条件的人，然后培养并且支持他们。后来有人认为我被戈尔巴乔夫先生弄昏了头，从而偏离了我最初的对苏政策，但事实证明他们是错误的。我之所以把他挑出来，是因为我正在寻找像他这样的人。我相信即使在苏联的极权主义体制中也存在着这样一个人，因为我相信无论是克里姆林宫还是古拉格劳改集中营，最终都无法压服人的精神。

[1] 安德烈·迪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 (1921~1989年)，苏联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参与制造了苏联的第一颗氢弹，人权的鼓吹者，要求解除核威胁，于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从1980年至1986年被放逐到高尔基市。布科夫斯基，前苏联作家，持不同政见者。瑞辛丝卡雅，前苏联诗人，持不同政见者。——译者注

正如我解释的那样，在首相别墅举行苏联问题研讨会时，东西方关系正在恶化。而且，随着欧洲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以及苏联以退出日内瓦军控谈判作为对此的反应，双方的关系还将继续恶化。但是另一方面，苏联的领导层中好像真的很快就要发生重大变化了。安德罗波夫虽然不是自由党人，但无疑也希望振兴苏联的经济——当时苏联的经济比我们了解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也想整顿官僚体制并提高效率。他虽然无法立即改变苏联的领导层，但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都年事已高，所以他还是有机会在这些人退休后任用合适的新人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当时已经有人怀疑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但是只要他还能再多活几年，就有可能把苏联的领导权交给年轻的一代。当时主要有两个人竞争接班人，一个是格里高利·罗曼诺夫，另一个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我要求手下给我提供关于这两个人的所有已知信息，但是相关的信息并不太多，其中有很多也不清楚，而且多为奇闻逸事。最初，罗曼诺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对我还颇有吸引力，但我很快就明白，这很可能会产生其他令人不快的后果。罗曼诺夫曾任苏共列宁格勒市第一书记，以工作高效而著名，但同时也是一个有名的强硬派。和许多他这种类型的人一样，他也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在他女儿的婚礼上，他摔碎了数个从列宁格勒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拿来的水晶玻璃杯（那可是无价之宝）以示庆祝。当我读到这些逸闻时，罗曼诺夫这个名字对我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我们对戈尔巴乔夫先生知道得不多，但就是这些关于他的不多的资料让我颇感振奋。他显然是苏共政治局内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成员，而且不是人们通常描述的那类政治局成员：上了年纪的老兵和知识官僚。他因思想开放而赢得了声誉，但这当然也可能只是一种风格。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现在的安德罗波夫，他在苏共党内稳步攀升，明显是一个被保护者，但这也很可能只能说明他听话而不是真有才能。不管怎样，我在那个时候晚些时候访问加拿大时，从皮埃尔·特鲁多那里也听到了赞许他的话。当他的名字在有关苏联的报告中被提及的时候，我开始对他特别关注了。

访问匈牙利

但是，当时我们与苏联的关系非常糟糕，直接和他们接触几乎是不可能

的，所以我认为必须先从东欧国家下手。匈牙利副总理马尔加伊先生曾在3月份大选前访问英国，并代表该国政府再次邀请我访问匈牙利。他告诉我匈牙利正在进行“经济试验”，这对我很有吸引力。马尔加伊先生曾经就利润和激励的重要性发表过评论，说政府没有义务发钱，因为政府没有钱。我特意记下了他说过的这些话，以备我自己日后发表演讲时使用。

出于几方面的原因，我选择匈牙利作为我担任首相后访问的第一个华约国家。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但他们还是很不愿意把它称为资本主义（除此以外好像怎么说都可以）。匈牙利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但过于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是会受到惩罚。亚诺什·卡达尔当时担任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他的领袖地位实际上是没有人能够挑战的。他的战略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最初可能是一句口号）来总结：“不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朋友。”他利用与西方的经济联系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了还可以忍受的生活水平，同时还继续保持着对华约集团、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忠诚——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因为自1948年以来，一直有大约6万苏联军队“暂时”驻扎在匈牙利。当时，卡达尔先生好像已经赢得了许多匈牙利人的尊敬，或者甚至说是爱戴，因为他一方面避免了1956年的事件重演，另一方面还使渐进式的改革得以继续。虽然他自己也曾遭到他的同志们的迫害，但他自己的历史也包含着许多罪行（这是匈牙利共产党老一代领导人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显著特点）：迫害并审判红衣主教闵真谛，杀害他的朋友、外交部长拉依克，以及背叛1956年的革命。但是，他曾当面向我否认对共产党改革派领袖伊姆雷·纳吉的死负有责任。事实上，他说他曾得到过苏联人的承诺，说会留纳吉一条生路。不管怎样，卡达尔能够执政那么长时间，说明他比其他东欧国家的领导人更加了解苏联人以及他们的想法。尤其是他认识安德罗波夫先生——在1956年的革命期间，后者曾任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所以我们相信他与安德罗波夫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希望通过他把我想说的话传递给苏联领导人。

1984年2月2日星期四，晚上10点钟，我走下飞机，踏上了匈牙利的土地，并受到了匈牙利总理拉扎尔先生的迎接。然后，我们踩着厚厚的积雪检阅了在泛光灯照耀下的仪仗队。第二天上午，我的第一项正式安排是与拉扎尔先生举行私下会谈。他是个性格谦和的人，但一言一行中都显示着对共产主义体制的忠诚。但是，他接下来说的话揭示了这种忠诚的根源所在。他说匈牙利仍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并警告我不要对此持有任何的怀疑，那样将会让

我此行成为最大的败笔。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在对匈牙利进行成功访问之后，在维也纳就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从而让匈牙利人非常担心。我意识到他们之所以能够进行有限的改革，是以在表面上与苏联体制保持一致为代价的。我立刻说我对此非常理解，后来在说话时我也非常谨慎。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我会见了卡达尔先生。他掌权的时间只剩下四年了，但仍然精力旺盛，大权在握。他方脸，大骨架，脸色健康；会谈中表现出平易近人的权威，而且明显是一个思维理性的人。他不像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那样在会谈时带着一大群幕僚，我俩会谈时只有翻译在场。

我想传递的主要信息是，西方国家和里根总统个人都是真心地寻求裁军。我们只想确保自己的安全，只想保留更低水平的军备，特别是核武器。我告诉卡达尔先生，我从好朋友里根总统那里得知，他之前曾试图更好地理解苏联，但他得到的反应却让他很伤心。我回忆说，我俩曾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花园里一起散步，里根总统告诉我，他曾给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写过一封亲笔信，表达了美国希望和平的愿望。他满怀希望地等了很长时间，等来的却是一封打印出来的标准样式的官方信件，内容很简短，而且口气也很轻蔑。我补充说，从那以后，里根总统开始切实加强美国的军备，然而他还是希望北约和华约集团的关系能有所改善。

我又试着想从卡达尔先生那里得知关于苏联的更加详细的情况。他向我描述了他认识的几个苏联领导人的性格，正如他说的那样：“苏联人也有不同的个性。”赫鲁晓夫是个冲动型的人。卡达尔先生曾经对他说，他像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和你见面时不说“早上好”，却很可能代之以朝你肚子来上一拳。卡达尔先生又描述说，勃列日涅夫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而安德罗波夫又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人。卡达尔先生描述的安德罗波夫性格强硬，工于心计，但又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他证实安德罗波夫确实生病了，但是头脑没有一点问题，也从没有停止工作。他还告诉我，安德罗波夫的病情正在好转，但匈牙利人已经在为他祈福了。他又说，苏联的领导层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且也正在吸纳年轻人进入。他们也期望和平，而且准备就此举行会谈。鉴于卡达尔先生和安德罗波夫先生的长期关系，我当然不能轻易相信他对克里姆林宫的描述。实际上，安德罗波夫六天之后就去世了，所以他告诉我的关于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要么是过于乐观，要么就是一个外交谎言。但不管怎样，他的观点还是很有趣的。

这次访问期间，我第一次体验了一个共产党国家里普通人民的生活，也觉得非常有趣。星期六上午，我参观了布达佩斯最大的中心室内市场，并与摊主和店主们进行了交谈，还购买了他们的蜂蜜、甘椒和调味料。虽然天气寒冷，但我周围还是聚集了一大群友好的民众。市场上的商品比我想象的更加丰富，但至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一大群摊主对我的热情欢迎。另外，两年前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以及苏联人给我起的“铁娘子”的绰号，都让我的反共名声在国际上更加响亮。我也对人们做出了热情的回应。回到伦敦之后，我看到有好几个记者报道说，我此次访问匈牙利时发现“共产党人也是人”。实际上，此行我发现或者说证实的一点是，共产党国家的人实际上仍然热切地渴望自由。

匈牙利人对于以前的匈牙利的自豪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正是这种自豪成为了新的、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匈牙利的基础。在圣坦德，我参观了当地的博物馆和艺术馆，里面收藏有许多价值极高的瓷器。声望很高的老馆长带着我参观，他穿的衣服很合体，但是有些破旧；鞋子擦得很亮，但明显已经有了褶皱。他的表情难以描述，一种深谙世事的样子，而实际上他也确实如此。他曾是一个贵族，后来失去了财产；在发生共产党革命的时候，他没有逃到国外，而是选择留下来并把自己极其丰富的关于匈牙利的历史和文化的知识传授给新一代人——不然他们就有可能忘掉这些。无论是他告诉我的有关他的国家的历史，还是我之前与卡达尔先生进行的会谈，都让我从中认识到，所有的匈牙利人（包括那些共产党统治者）对他们的国家的身份地位都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这次访问中也有让我感到吃惊和失望的事，其中之一就是匈牙利离自由经济还有很远的路程。匈牙利已经出现了一些小型的私有企业，但它们的成长受到限制而不能超过一定的规模。匈牙利没有把经济改革的重点放在增加土地或者投资的私有化上，而是放在个人或者合作使用国有设施上。在圣坦德，我参观了英国公司参与的一个住房工程。从与人们的交谈中我得知，他们可以购买他们自己的住房，但是却不能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这些住房，而只能卖还给国家——这与工党在英国主张奉行的出售市政公房的政策多少有些相似。

我写信给里根总统，讲述了此次匈牙利之行给我留下的印象：

匈牙利的经济试验是在非常严格的限制之下进行的：他们还是实行一党制，对媒体仍然加以控制，议会有名无实。除了最小的经济

单元以外仍然全是国有制，但最重要的是它仍然与莫斯科保持着亲密的盟友关系。卡达尔和拉扎尔明确表示这些都不能改变……我越加相信，如果我们能够为东西方的互相理解先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基础，我们就更有可能在军控谈判的细节上取得进展。但是，我认为这一目标并不是很难实现。这将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而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绝不能放松警惕。不管怎样，我认为我们必须努力一试。

回顾起来，这次匈牙利之行帮助我形成了英国对那些受到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的独特的外交政策。第一步是与这些国家建立更广泛的经济和商业联系，让他们减轻对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依赖程度。然后，我们将在人权方面施加更大的压力。最后，当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减弱的时候，我们将使他们在西方的帮助下在国内进行政治改革。我此次匈牙利之行正是为这一成功的外交战略拉开了序幕，而事实也证明此行的意义比我要想象的要重大得多。

莫斯科：安德罗波夫的葬礼

我从匈牙利回国没几天，安德罗波夫先生就去世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到苏联去参加他的葬礼，这样我就有机会见一见新的苏联领导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他的上台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原来以为契尔年科先生不会成为领导人，因为他年龄太老，身体多病，而且与勃列日涅夫先生以及他的那个时代关系过于密切。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们的确比苏共中央政治局里他的那些同事们更加精明。西方的评论家们至少不会把这个上了年纪的趋炎附势者描述为一个先驱，能够在一夜之间把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转变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2月13日星期一晚上9点30分，我们一行人乘坐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那天天气非常冷；当我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冰块前行的时候，真希望自己穿的是一件厚厚的俄罗斯毛皮大衣。那晚我们在英国大使馆下榻，那是一幢非常雄伟的建筑，隔着莫斯科河与克里姆林宫相望，是19世纪末为一个乌克兰粮业巨头建造的。（后来，当使馆的租期结束时，我与戈尔巴乔夫先生做了个交易：请他允许我们继续使用现在的大使馆；作为交换条件，苏联驻英国的

大使馆在租期届满后也可以继续使用。我和外交部的观点相同的时候不多，关于英国驻外使馆问题却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都认为英国的使馆建筑必须雄伟而有特色，里面还要有精美的画作和家具。)

举行葬礼那天天气晴朗，但是比我们到达那一天更冷。出席这种场合，来访的贵宾们都没有座位：我们不得不在一个特别划出的区域里站了好几个小时。后来，我和苏联新任领导人见面并进行了简短的秘密会谈，他语速很快但又磕磕绊绊地念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科先生陪同会谈。这是一次正式会谈，内容涵盖了先前军控谈判的所有问题。但是，这次会见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由于要站上好几个小时，所以我听从了罗宾·巴特勒的建议，没有像以往那样穿高跟鞋，而是穿了一双内衬皮毛的靴子。这双靴子非常贵，但当我与契尔年科先生见面时，我突然想，这双靴子可能很快又会派上用场了。

戈尔巴乔夫访英

现在，我必须考虑我的战略的下一步，确切地说，就是与苏联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显然，我们必须与苏联领导人进行更多的接触。杰弗里·豪建议我们进一步邀请契尔年科来访，但我认为此事为时尚早，我们需要先多看一看新的苏联领导人要朝哪个方向走。但是我很愿意邀请其他人，于是我们向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苏联其他几个高层领导人发出了邀请。很快，戈尔巴乔夫先生表示愿意来访——这将是第一次访问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表示想尽快成行。此时，我们已经获得了更多关于他及其妻子赖莎的背景资料。与苏联其他主要领导人的妻子不同，赖莎经常出席公共场合，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位擅于表达而且很有魅力的女士。我决定邀请戈尔巴乔夫夫妇前来首相别墅会谈，希望乡村别墅的氛围能够有助于举行良好的会谈。我认为这次会谈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在他们来访之前，我又召集苏联问题专家开了一个研讨会，探讨了双方可能谈及的所有议题以及我应该采取的应对之策。

12月16日星期天上午，戈尔巴乔夫夫妇乘车从伦敦前来首相别墅，抵达时正好是午饭时间，我们在别墅的大厅里用午餐。席间，戈尔巴乔夫先生告诉我一路看到那么多的农田是多么的有趣，于是我们比较了两国农业体制的不

同。他负责农业事务好多年，在改革集体农场方面也明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分配不当，粮食损失竟然高达30%。

赖莎·戈尔巴乔娃也是第一次访问西欧，只懂一点点英语，而据我所知她的丈夫一点都不懂。但是，她穿着一身非常精致的西式套装，那是一件剪裁得体的、带有白色条纹的灰色套装——我想，这也是我愿意穿的那种衣服。她有一个哲学的学位，事实上还是一位学者。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戈尔巴乔夫夫人是一个忠诚而强硬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参观图书馆时，她从书架上拿下一本霍布斯的《利维坦》，明显很感兴趣，此举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我后来（我卸任之后）从她那里得知，她的祖父竟然死于斯大林时期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他是一个富农，而在那场运动中有数以百万计的富农被杀。所以，她们一家没有理由对共产主义抱有幻想。

我带了相当大的一个团队出席午宴，包括威利·怀特洛、杰弗里·豪、迈克尔·赫塞尔廷、迈克尔·乔普林、马尔科姆·里夫金德（外交部的国务大臣）和保罗·夏农，另外还有一些顾问。苏联方面除了戈尔巴乔夫夫妇以外，还有苏联驻英国大使扎马丁先生，以及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先生——他是戈尔巴乔夫的顾问，说话不多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和戈尔巴乔夫对琐事都没有兴趣，所以我们的谈话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活跃的双向辩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争论一直都在继续，而且每当我们见面时都会再次发生。由于辩论涉及了核心问题，即政治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我对于这样的辩论一直乐此不疲。

他向我介绍了苏联体制下的经济计划，从大工厂向较小的工程和“商业”的转变，雄心勃勃的灌溉计划，以及工业计划者根据劳动力数量来调整工业产量以避免失业的方法。我问他，如果尝试着把改革建立在自由企业制度的基础之上，鼓励并放手让地方企业自主经营，而不是由中央对所有事情都做出指导，这样改革的进程会不会更加容易一些。戈尔巴乔夫先生愤怒地否认苏联的一切事情都是由中央控制的，于是我换了一个策略。我解释说，与生活在只依靠再分配体制下的人民相比，在西方的体制下，包括最穷困的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最终所得都要更多一些。事实上在英国，我们正在尝试减税以激励人们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并在世界市场上参与竞争。我说，我不想拥有主宰所有人的权力：决定他们应该在哪里工作，他或者她应该得到哪些东西。

但是，戈尔巴乔夫先生还是坚持认为苏联的体制具有优越性，说它不仅创

造了更高的增长率，而且如果我到苏联去的话，将会看到苏联人民生活得多么“快乐”。我反驳说，如果真是这样，那苏联当局为什么不愿像英国这样，允许它的人民自由地离开他们的国家呢？

我特别批评了苏联政府不允许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做法。他则声称，80%愿意离开苏联前往以色列的犹太人都已经获得了批准。我说我听到的情况可不是这样。他又重申了苏联的立场，说那些被禁止离开的人都工作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部门——这一点我同样不相信。我知道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深究并没有意义，但我已经说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必须让苏联人知道，每次见面时我们都会提及他们禁止移民这件事。

午宴结束后，我们离开餐厅到主客厅喝咖啡。除了杰弗里·豪、我的私人秘书查尔斯·鲍威尔和翻译以外，我的幕僚们都离开了。丹尼斯也带着戈尔巴乔夫夫人到屋外参观。

到这一阶段，如果我只关注戈尔巴乔夫先生在谈话中讲到的内容（大多数都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路线），那我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与通常的共产党人如出一辙，没什么两样。但是，他的性格与一般的苏联政府官员却有着极大的差别。他在谈话中会微笑、大笑，还运用手势来加强语气，并调整自己的语调。他会在一个问题上坚持争论下去，是一个敏锐的辩论家。他很自信，但也会很尊敬地引用契尔年科的话来为自己的讲话增色——但这些话并没有太大的启发性。在谈到一些颇具争议的政治问题时，他没有丝毫的不自然。在之后进行的几个小时的会谈中，他的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说话从不照着准备好的稿子念，而是看着一个小笔记本上的提纲发言。只有在涉及外国人名的发音时，他才会询问他的同事。他奉行的路线与我预料的没有什么两样，但他的风格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随着时间的过去，我逐渐认识到，体现他的潜在人格个性的正是这种风格，而不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说辞。我发现我很欣赏这个人。

在与戈尔巴乔夫的讨论中，军控是最实际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苏联外长葛罗米科定于次年年初在日内瓦会面，看能否重启目前陷于停顿的军控谈判。在访问匈牙利时我就发现，在讨论军控问题时，最好是在一个比较平静的气氛中向对方说明，我们这两个互相对立的体制必须肩并肩地共存，同时减少敌对和军备。现在，我又故技重施了。

我补充说，我们可能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代政治家了，所以

我们有责任确保这样的悲剧不会再次发生。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开始讨论相关的细节，而我也很快就明确地意识到了两点。首先，戈尔巴乔夫先生对西方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对我的演讲发表了看法——他显然是看过这篇演讲。他还引用了帕默斯顿勋爵^[1]的名言：“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对话被泄露并刊登在了美国媒体上，他对此事也非常关注和了解。这些对话的大意是，阻止苏联的经济从停滞中复苏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还拿出了一张《纽约时报》绘制的图表，图上标明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器的爆炸当量，并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爆炸当量进行了对比。他对当时流行的词语也很熟悉，和我谈起了核大战后可能出现的结果——“核冬天”。但这些话并没有打动我。我说，与“核冬天”这一概念相比，我对怎样避免在“核冬天”到来之前出现的一片焦土、死亡和毁灭更感兴趣。但是无论如何，拥有核武器的目的是阻吓战争而不是发动战争。核武器在更大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保护，让我们得以避免战争，而这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军备降到一个更低的水平。戈尔巴乔夫先生认为，如果两方都继续积累核武器，早晚会引发意外或者不可预知的情况；而鉴于我们目前的武器生产速度，我们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应该立即做出决策。他还引用了一句意思不很清楚的俄国谚语来解释，“没有装子弹的枪每年也会走一次火”。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苏联从总体上不信任里根政府的意图，特别是他们的战略防御计划。我不只一次地强调说，里根总统是可以信赖的，他最不想要的就是战争。像在匈牙利访问时一样，我又提到他给勃列日涅夫写的那封信，及其背后对和平的期望。这件事体现了美国人的特点。美国从来就没有统治世界的愿望。“二战”刚刚结束时，美国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美国人并没有用它来威胁别的国家。美国并没有滥用自己的实力，而且对其他国家还非常慷慨。我也明确指出，我虽然强烈支持美国人发展战略防御计划，但我并不赞同里根总统的观点——他说这是让全世界完全消除核武器的一种方式。我认为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因为你不可能消灭制造核武器的知识。但我

[1] 帕默斯顿，英国政治家，以努力维持欧洲权力均衡而为人称道。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年，1835～1841年，以及1846～1851年）和首相（1855～1858年和1859～1865年）。——译者注

也提醒戈尔巴乔夫先生，苏联是第一个发展反卫星武器的国家。要阻止太空武器系统的研究明显是不切实际的，但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关键的阶段，因为这些研究的结果正在转变为大规模的武器生产。

随着我们的谈话的进行，我明显认识到苏联人确实对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非常担心。他们想阻止这一计划，而且几乎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被用作了里根总统的一匹掩护马^[1]。我还意识到，我是在与一个老谋深算的对手打交道，他将无情地利用我和美国人之间的任何一点分歧。所以我坦率而明确地告诉他（在会议结束时又重申了一遍），不要试图离间我和美国的关系：我们将继续做美国坚定的盟友。我在这一问题上的坦率态度尤显重要，因为我同样坦率地指出了里根总统不切实际的梦想——试图创造一个无核的世界。

会谈原定于下午4点30分结束，以便让戈尔巴乔夫先生早点回到苏联驻英国使馆出席一个招待会，但他却说想继续谈下去。直到下午5点50分，他才离开了首相别墅。临走前，他又给我讲了一个俄国流行的谚语，大意是：“山里人不能没有客人来访，就像他们离不开空气一样。但是如果客人待的时间太长，他们就会窒息。”他离开时，我真希望刚才与我交谈的就是下一任苏联领导人。其原因正如我后来对媒体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我能够与之合作的人。

战略防御计划

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已经让苏联人和戈尔巴乔夫先生如此警惕，而事实也将证明它是西方赢得冷战的核心要素。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那样，虽然我和里根总统的观点迥然不同——他认为战略防御计划是实现世界无核化的重要一步，而我则认为这一目标既不可能实现，也不符合我们的愿望——但对他做出的继续推进这一计划的承诺的正确性，我却没有丝毫的怀疑。回想起来，现在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战略防御计划是罗纳德·里根在其总统任期内做出的最重要的一项决定。

在英国，我严格地控制着与战略防御计划有关的决策以及我们对它的反

[1] 猎人接近猎物时用作掩护的真马或者假马。——译者注